

# 文化



# 澳門在與東方的文化交流中的角色\*

黎祖智\*\*

翻譯：吳志良

## （一）從文明的記憶到一種有收獲的對

不久前，我們有幸邀請來參加東亞大學葡萄牙語研究中心今天舉辦的葡國文化研討會進行第一講的瑪麗婭·伊達琳娜·列辛娜·羅德格斯教授還寫道：“……（在各國人民和民族中融滙交流的）葡萄牙文化，具有極度的同質，吸收當地的養料，兼容並包，再向世界傳播。”“文化交流是有益的，無論是對接收還是傳播的人，均可得到刺激；文化交流值得感到歡欣鼓舞，因為可豐富補足。”“豐富補足是相互的，還可以生根。”

這些話語儘管是更加針對我們回歸歐洲和背負着那“成熟文化的包裹”而言的，但是，同樣完全適用於拓展地平線的散居力和意願。這一散居力和意願總是把我們引向更遙遠的地方，融合到不同的文明和文化中。我們曾經是，且現在還是這些文明和文化的中介人。不僅在回歸古老大陸的路途上，更多的還是在服務於世界時，“各種模式新陳代謝，互相對話，衝擊和問候。”儘管我們不應自暴自棄，堅持由我們來決定古老大陸的節拍和目標，但它們已經不受我們影響，我們將永遠沿着別人走過的足跡前進。

因此，我認為，可以用這個主體思想適當地開始這次研討會以及其發起人要我在此作的發言。我的發言僅是開場白，我們的文學院的三位教授，將在目前任教於東亞大學的葡萄牙語言文化協會的講師的協助下，在這幾天進行一系列的講演。

---

\* 黎祖智博士在東亞大學葡文研究中心舉辦之葡國文化研討會開幕禮上的發言

\*\* 澳門基金會主席

這些能力得到公認的教授，將從歷史和科學的角度，探討這次研討會的主題。而對那些機構的負責人來說，則應創造條件，使得數世紀的文化交流可以延續下去並結出果實。多種文化在此地找到了經久不衰的交匯點，而深受文化長期共處影響的絕無僅有的澳門，已經進入了歷史的轉折點。

佩索亞說：“東方為我們送來了一切——光明和信仰”。中國為其絲綢尋求市場時，首先發現了西方。然而，是葡萄牙人為歐洲貿易開拓了香料、陶瓷、茶葉和寶石的土地，令東西方人民和文化更接近。我們在休達為遠征奠定了基礎，直到抵達聖名之城澳門。正因為此，澳門變成為——用若瑟·奧古斯托·塞阿布拉教授的原話來形容——“我們四海為家的生活方式的最好寫照。”

需要知道的是，若干世紀的歷程和至今喚起我們的民族特性的文化記憶，到底留下了什麼，而今天納入一個新的特殊的社會經濟空間的葡萄牙，在結束一個歷史時期的時刻，可以運用什麼工具去延續與東方古老民族的文化對話。

眾所周知，除開那些集市，堡壘和教堂這些活生生地證明一種生活處世方式的石頭建築，在遼闊的東方，還四處散居著有明顯或尚存葡萄牙根源的社團和一種語言。這種語言，有多種吸取了當地的養份而得以充實的土語變種，構成新的溝通途徑。這一切，均有待一個系統、比較的研究，儘管該領域已完成多項卓著的研究。

今天尤其值得我們關注的是那些生氣勃勃的社團以及至今為那些社團服務的機構，使得葡國文化遺產世代相傳。如果沒有這份遺產，我們的對話能力將不可救藥地受到影響。

## （二）葡國文化影響在印度、馬來西亞和日本的活生生的例子

由於時間有限，我們不可能詳盡列舉深受我們影響的活生生的例子，我們只簡略地看看印度次大陸，馬來西亞，日本的事例以及在我們將在澳門和通過澳門發展智力交流的新的匯點，為中西方搭橋鋪路。

### 印度次大陸

我們從果阿說起。果阿納入印度版圖二十七年之後，儘管那些受過葡國教育的果阿人不懈努力，保持自身的令其形成一個文化意識截然不同的社會的傳統和語言，但是葡國的影響日益減弱。

多個活躍程度不同的文化中心，仍然在那兒開展活動。其中，我們列舉孟內澤斯·德·布拉干薩學院（前身為詩人托馬斯·里貝羅在一八七一年創立的瓦斯科·達伽馬學院）；現在的中央圖書館（前身為瓦斯科·達伽馬圖書館，附屬於同一名字的學院），大概還收藏著上世紀以來果阿出版的葡文報紙的合訂本和葡

國作家之外果阿作家的作品，尤其是一九六一年前的著作；拉丁文化中心，該中心出版《果阿之聲》；歷史檔案館；葡萄牙語學會；葡萄牙文化和語言研究協會以及高秉根基金會贊助創立的沙勿略歷史研究中心。我們上次訪問果阿後獲知，將在畔京創辦華昆特勞·鄧波印葡研究中心，紀念一位畢生致力於研究和傳播葡國文化的已經去世的律師。這個新的研究中心試圖在果阿，達滿和帝烏推廣葡語研究以及致力於調研。順便值得一提的是，儘管隣邦多年來施加壓力，要吞併這三個地區，而這幾個地區的居民，不管地理分隔，頑強地堅持團結一致。

葡萄牙一直向果阿的文化中心郵寄書籍，錄音帶和其他輔助材料，但缺乏高質量的師資，而且在這個問題上，政治上尚存在某些懸而不決的問題。衆所周知，印度的某些大學和果阿的一些學校教授葡語，作為選修課。而負責研究籌組果阿大學的委員會提議，考慮到葡語對那兒現存的收藏豐富的檔案館的歷史調研的重要性，把葡語列入大學教授的語言。葡文報紙已經完全消失了。但是，保存下來的，是至今仍顯而易見的地區居民的基督教傳統。

然而，不僅在果阿，達滿和帝烏至今可以覺察到葡萄牙在印度的影響，在其他地方，也存在葡萄牙根源的細小的土著社團。我回想起，一九八三年在里斯本召開的“世界葡語現狀大會”上，便特別提到喬爾。在喬爾，尚存在一個充滿活力的同類的印葡社團，不講雙語，在科爾賴村好似只講一種很古老的葡語。

另一個有趣的例子是座落在今天的斯里蘭卡的巴提卡洛阿社團，至今還使用一種無疑是源自葡語的語言。我不能不提及一下當地一個俱樂部的一封召集會議的信件。信以“O R D E M   D O   D I A”（日程）開始，以“S E U S I N C E R A M E N T E”（你忠實的）結束，簽署為“R I E N Z E B A L T H A Z A R ,   S E C R E T A R I O”（秘書，里恩澤）。議程的第一項是“P R E S I D E N T E   S U A   B E M V I N D A   P A L A V R A”（主席致歡迎辭）……這便是斯里蘭卡葡語土語的活靈活現的例子。葡萄牙人十六世紀初開始在那兒傳播基督信仰，甚至為科特國王和雅芙納幾個貴族家族洗禮，在整個島上留下許多至今還應用的名字，如 A L M E I D A , F E R N A N D O , G A B R I E L , R O D R I G O , A L W I S , C O S T A , P E R E R A , F O N S E K A , 等等。此外，僧伽羅語還似東方其他語言一樣，吸收了大量葡語詞匯。

## 在東南亞——馬六甲活生生的影響

關於馬六甲，這兒僅一筆帶過。因為幾乎所有的到會者都知道那兒有一個小小的團體，生活在離聖地亞哥大門不遠的海邊已經有多個世紀，繼續頑強而驕傲地與葡萄牙唇齒相連，保持着自身的風俗習慣和獨具一格的語言——P A P I A C R I S T A N G（基督土語）。

葡萄牙在當時東方最大的商業中心的文物影響，已經所剩無多，但這個細小的團體繼續聚集在 K A M P O N G   S E R A N I 或 K A M P O N G   P O R -

TUGI S或曰葡人居住地里，居家所在的街道，至今仍保留着ALBUQUERQUE，EREDIA，ARAUJO，GODINHO和SEQUEIRA等葡文名字。由於環境的關係，我與這一社團及其領導人保持着密切的聯繫，本人希望這個月再次與他們相聚數日。

這個至今認為葡萄牙為自己的祖國的馬來葡人社團的生存，全賴於我們能夠給予的支持。一九八一年起，馬六甲教區——聖·彼得羅教區——脫離了葡萄牙傳教團，但澳門教團欲繼續保留在那兒的葡國傳教士。在新加坡也如是，儘管已經不再屬於葡國教團，但那兒的天主教徒依然認為古老的聖·若瑟教堂是葡國使團。馬來西亞一個年老的神父曼努埃爾·平塔圖，在那個社團裏已經生活了四十多年，將大部份時間致力於研究該地區葡萄牙的影響。他有一大批待出版的著作，並欲將其圖書館和檔案館捐贈給未來的葡萄牙文化中心。本人認為，如果不缺乏實現此一創議所需要的資源的話，另一位孜孜不倦、享有盛譽的研究者和教師——路易絲·菲力甫·托馬斯博士，是籌組該文化中心最合適的人選。

如今困擾馬六甲人的一個問題是，如果特別考慮到他們的後代的前途，他們應該努力更好地融合到馬來西亞這一整體，而逐漸失去其自身的特色，或者繼續作為自治的社團。這便是隱現在《吾國吾民》的悲劇。《吾國吾民》是最近去世的一卓著的領袖貝納德·聖塔·瑪麗亞的作品，他認為“對葡萄牙在遠東的後裔進行一項更廣泛的研究，以估量其共同的力量，觀察其問題和預測其前途，是刻不容緩的”。

關於葡萄牙在印度尼西亞的影響，我們可以參考高秉根基金會出版的安東尼奧·平托·德·弗蘭薩大使的著作《葡萄牙在印尼的影響》。由於時間所限，且與會者較為熟悉，我不再敘述我們的影響依然顯而易見，且對葡國的興趣更加濃厚的泰國和東南亞其他國家。至於中國，曾經有一些小規模的葡人社團，但一九四九年之後，都集中到香港，或移民外國了。如今，葡萄牙努力發展與中國在各個層面上的交流，力所能及地執行一份“文化合作協議”。

## 特別值得一提的日本

列舉這些事例時，我不能不突出地提到日本。日本由於她在當今世界中所佔的重要性以及在建設未來社會中繼續要扮演的角色，值得特別一提。

葡萄牙在這個現代技術領先的國家的深刻影響，初始恰好在科學和技術領域。

正如阿爾曼都·馬丁斯·雅內拉大使在《葡萄牙對日本文明的撞擊》一書中強調的那樣：

《……如今根本不可能估量葡萄牙文化對日本文化的撞擊的影響到底有多深遠以及還留下了多少。葡萄牙人帶往日本的天文，地理，建築，戰術，自然科學，尤其是醫學和航海，造船技術和印刷術方面的知識，並沒有喪失殆盡

。不僅對日本人的思想產生了影響，還為一種簡樸、有時甚至原始的新的科學態度和思想方法奠定了基礎。日本的知識分子在其後的兩個世紀裏，或單獨地，或借助於荷蘭人的經驗，將之深思熟慮並發揚光大》。

在這個前提下，火槍的引入，革新了風俗並改變了傳統力量的平衡，產生了特別深遠的影響。

不久前，葡國電視台播放了澳廣視製作的一個紀錄片，題為《種子島，火槍島》。這部紀錄片是有關在東方的葡萄牙傳統的系列的第一部。

這部紀錄片的作者沙凱撒和羅永年，是這樣描述他們在一年一度的火槍節時初次踏上該島的感覺的：

“抵達天涯海角的一個島嶼，在路上遇見盛裝的十六世紀的葡萄牙人，迎面是一艘葡國船隻，基督的十字架懸掛在滿張的風帆上，聽人述說“航海巨人”的事蹟，而恩里克王子的塑像就座落在碼頭上，所有這一切，發生在日本南部離沖繩不遠的海域裏。這是重新思考我們在歷史上的地位的絕好時機。沒有一個虔誠的葡萄牙人可以抵擋住這個感人至深的撞擊。”

事實上，心敬神拜地重溫透過葡萄牙與東方的最初接觸，並不止於種子島。在其他地方，例如在大阪附近的古城坂井，每年都在城市的節日裏紀念葡萄牙人抵達日出之國。澳門多位總督，都有幸作為貴賓應邀參加這些紀念活動，從而為發展日本的一些城市與我們的聖名之城的有益的交流創造了機會。

披上節日盛裝，形似葡國帆船的汽車，在用大概是從著名的屏風上的人物形象模仿製成的服裝，按十六世紀的風氣打扮，佩帶著古老的大口徑手槍的男人的護送下，在節日期間沿街奔走，吸引了成千上萬的遊客。還是在種子島，日本人第一次試驗了火槍。而離葡人在十六世紀登岸的海灘不遠的一個地方，如今是科學火箭發射中心，是令日本處於技術領先地位的計劃的一部份。

醫學和現代外科手術是由耶穌會士引入的，而這些耶穌會士還發展了天文學氣象學和醫學。另外，葡國的船隻，刺激了造船業和航海，地理以及製圖學的完善。弗蘭西斯科·卡爾丁神父的日本地圖，於十七、十八世紀在歐洲廣為流傳。

十六世紀，不計神學院和一間人文學和修辭學學院，耶穌會在日本有將近二百間學校。事實上，倘若如伊納修·德·羅若達所說，教育是“傳播信仰最有力的武器”，那麼，葡萄牙在日本的主要遺產，最能延續和經久不衰的，正是今天為數百萬日本人追崇的基督信仰。

儘管武士統治時期與世隔絕長達三個世紀，其間切斷了與西方的一切接觸，但日本人今天仍然帶着虔誠和敬拜的心情緬懷與葡人的交往，且對葡萄牙的好奇心仍然強烈。

即使在一個如一九八五年在東京郊外的築波舉行的尖端技術的博覽會上，葡

萄牙的展場縮在一個不顯眼的角落，葡國的事物尤其是展場突出的火槍的歷史和航海發現的史詩，吸引了不計其數的日本人參觀。

實習艦“薩格列斯”號的海員訪問大阪和日本其他港口時，以及其他經過那些地方的人，都可以證明日本當局和人民對葡萄牙的尊重。

而事實上，日本對葡萄牙文化有特殊興趣，專業的歷史學家致力於此一研究。除賈梅士和佩索阿之外，葡萄牙作家諸如米格爾·多爾加，費爾南都·納莫拉的作品已被譯成日文。另外，在日本備受崇拜的溫塞斯勞·德·莫拉斯的全集和葡國最通曉日本的阿爾曼都·馬丁斯·雅內拉的著作選集，也被翻譯成日文。在德島，有一個紀念莫拉斯的博物館。

同時，雅默·科埃略神父完成了一本葡日詞典，而一些大學，如東京的索菲亞天主教大學，設有葡語教研室。另一方面，葡日文化學會進行研究，編輯一份學報，而葡日商會將加強與葡萄牙的商業關係。葡日商業關係，透過澳門始於日本南部城市長崎。多個世紀的交往，這個城市與葡萄牙關係密切，居民喜歡向遊客獻上本地的特產——一種與我們的完全一樣的鬆軟的點心。

如今，住在日本的葡萄牙人少之又少，但是，我腦海中對日本眾多回憶中，時常浮現出橫濱郊區一個居住在東方已經四代的年老葡萄牙人的日本家庭的畫面。他家的會客室裏，無論是裝修，家俱還是用來沉思的花園，全部日式佈置，唯一一件不是日本的物件是一面葡國大旗，鑲嵌在一個日式的貴重的框架裏，掛在最顯眼的一面牆上。

然而，不幸的是，我們同現代日本的交往還不足夠。我們甚至沒有能夠利用上涌向歐洲尋求另一種文化和文明的日本遊客，從中得益。

遙遠的距離和或許永遠不足的資源不允許開展更加豐富，且葡國可能從中獲益不淺的交流。

最後，讓我們和耶穌會最傑出的一位會士——長住澳門、寫下著名的《殉道者使團》祭奠一六四零年在長崎登陸的葡萄牙人和其他基督徒的潘日明神父一起呼籲：

“我們認為，世界葡語社團有必要共同行動，從政治、商業和大學的層次上，全面致力於恢復與日本的文化交流。假如東西方兩端連結在一起，對我們和對全世界，該是多好的一件事……”

這一思想成為他的新著、最近由澳門文化學會出版的題為《東西合璧》或《澳門的文化交流》的主題。他在書中指出：

“在那些知道以全面開放的精神共處的人和人民之間，用我們自身以及所有進行靈魂的交流，持續而長期的滲透，勝於其他文化形式，代表着中葡這段歷史在特定的時間和空間裏牢固地形成的生活的綜合。我們擁有兩種歷史悠久的輝煌的文化——中國文化和葡國文化，這兩種文化就在這裏——澳門相融滙合成創造性的交流。”

### （三）加強衆多葡人社團的聯系

時間不容我們列舉此一影響的更多例子。關於這個影響，白妲麗博士在她的一篇論文中恰如其份地概括道：

“我們發覺——因此我們感到自豪——的是，即使在葡萄牙的物質影響已經消失的地方，我們在那些與我們共處過的人——即使沒有把他們殖民化——的精神上留下的烙印，仿佛存在某樣永恒的東西。留給他們某樣難以解釋的東西——一種深情，一種回憶，一種可以用一個我們特有的詞匯來表達的感情。這個詞匯，同時也是馬六甲葡語的詞匯“SAUDADI”（思念）”。

假如我們知道加強這一系列無邊無際的葡人社團的紐帶，加強那些可能至今尚為葡萄牙服務的衆多機構的聯系，此一對話將超出我們的行政和政治影響之外，在未來世代相傳。然而，迫切需要行動並理解澳門可以在這一背景下扮演的極其重要的角色。

在描繪一九九九年主權轉移的政治行政藍圖的《中葡聯合聲明》決定的環境的推動下，一些人士和機構——其中某些僅是微妙而偶然地與葡萄牙在東方若干世紀的影響聯系在一起的人士和機構，開始擔任完成一個急迫並且不容置疑的民族使命的角色。這個使命，便是維護和保存葡萄牙文化在澳門和這一片遼闊土地的影響。

人們對一份歷史遺產的興趣煥然一新，是極具建設性的，將此一歷史遺產規劃到兩國正式協議規定的期限之外似乎是所有葡萄牙人的共同願望。因此，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在這一背景下和未來歲月裏要進行的一切行動，只有源自廣泛的共識，才合法，有效，才能持續下去。而這些共識，只有在澳門人士和機構的直接參與下方可達成，而非人為強加一些不成熟，甚至過時的措施，即使這些措施表面上看來有用，也不論那些剛剛得到權力的人的願望是如何的好，他們有權對非常複雜的過程進行干預，因而要求對本地現實有足夠的認識。要防止可能出現的過份的積極性，並以務實的態度在葡國管理的最後十年之始，尋找出與我們所在的歷史時期相適應的解決方案。

### （四）文化交流的有利工具

澳門的文化活動幾乎長期依賴個人的推動，由於某些人的慷慨資助，一些還取得了不可否認的成績，但缺乏連續性。到一九八二年創辦了澳門文化學會，才有可能制定一條較具連貫性的文化政策。這個機構，儘管由於政府行動的不連續性——這一事實嚴重而全面地影響了澳門的進步——而導致指導方針的某些急劇變化，但在其短短的歷史中，做了頗具意義的工作，尤其是在鑒定和保存文化遺產和尋找賦於澳門自身特色的價值方面。澳門自身的特色，是多種文化長期交匯

和人類共處的結果。人們在此地一直和睦相處，只是偶爾受到不可控制的外來因素的騷擾。

因此，在新的創議開始得到連貫性而不能輕率進行的時刻，這一文化共處應得到理解和尊重。面對澳門新的形勢，需要重新考慮文化學會的角色並準備設立一個新的機構，補充它的活動。這一機構，接受並擴充它的一些職能，可以超越任何行政過渡或政治變化，活生生地保存一份珍貴的遺產，並為發展文化對話和共處建立有力的支柱。在葡萄牙歷史享有盛譽且幾乎得到普遍接受的這些地方，文化對話和共處應該繼續下去。而在地球上一個在二十一世紀充滿希望的地區，葡萄牙人可能還有一個使命要完成。

最近，東亞大學——一所外國高等學府，但是本澳唯一的一間——劃歸到澳門基金會屬下，由澳門基金會承擔起特殊的責任，令她適應本地需要，重點為澳門服務，為未來培養必需的人材並更新他們的知識，賦於她活力，進行文化活動和面向澳門問題的科學研究，讓越來越多的合格的中葡學者和技術人員參與大學事務，已經邁出了極其重要的一步。然而，是設置一個新的機構的時候了。這一機構，最好由一個基金會來維持，技術上由本國的機構支持，專責傳播葡萄牙文化價值，促進葡萄牙文化與那些跟葡國多個世紀來保持文化關係或僅是商業和共處關係的東方民族的文化的對話，研究關於葡萄牙和澳門與該地區的人民和國家的文化、社會直至經濟問題，透過真正的文化代理人而不僅僅是講師來協調語言和文化領域的行動，推動與其他文化、科學機構的合作，加強葡語文化社團的團結以及在葡國和通過葡國在歐洲傳播東方各國文化。

這是一個雄心勃勃的計劃，但我們認為完全在力所能及範圍之內，葡萄牙東方學院的模式，是數代澳門或與澳門相關的許多葡萄牙人一直思考和研究的題目。

回到大學，以葡語教授或葡國學術參與更多的新的課程正在推出。並將與中國的高等學校和研究中心加強聯系。

我們回應目前的需要並相信時間不容我們等候更理想的條件來完美地推出每一個新的課程，因此，果斷決定開設這些課程。我們雖然冒着課程可能輪廓未清的危險，但我們情願避開過份的謹慎指引的平坦道路而大膽回應。因為過份的謹慎，可能延緩昨天應該誕生的創舉。

東亞大學葡萄牙語研究中心也應加強活力。目前，已經爭取到東方基金會的一些支持。大學應有一個葡萄牙學教研室，由一個能夠賦於其形式和內容、完成傳播語言和文化的使命並持續而有效地與同類大學和機構建立交流關係的、知名的葡國學者來指導。

## **（五）決定性時代的挑戰——應持續下去的共處的基礎**

其他的創議將接踵而至，目的只有一個，即在近期或遙遠的未來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環境下，為整個社會作好準備，迎接這一決定性時代——澳門新一代——

一的挑戰，根據我們能夠令中葡協議上制訂的未來的計劃成爲可能的能力，所有的負責人，應盡忠守職，不怕變革和未來的撞擊，以跟現代社會在“節日尾聲”中表現出來的疲塌、鬆散或純粹的“表面”功夫格格不入的堅定、果斷和現實的精神，將之付諸實施。

特別是，新的政治體制剛好與本世紀的結束相吻合。新世紀的誕生，帶着魔幻，神話和烏托邦的色彩，同時也是一個目標，指引着世界各地教育家的思想。人們相信現代技術先進的社會，但在這一社會中，對人的尊嚴、正義、平等和更好的生活的想往是永恒的。誰也不會忽視，特別是在大學中“未來的夢想”找到更平穩的道路而實現之。

借此機會，我們回味一下一位最近去世的令人懷念的文人的話語：

“葡萄牙能夠在澳門留下的最大遺產，應是一所按現代模式建立的大學。這所大學，將是知識交流的匯點，溝通中西的橋梁”。

我爲此多年主張創建的葡萄牙東方學院和東亞大學（簡稱澳門大學，爲何不？），將成爲價值無比的工具。可是，它們需要本國機構的技術和學術支持。除開卓有建樹的高秉根基金會，還應提到葡萄牙語言文化協會及其講師室。

葡萄牙文化協會協會可以有效地加強與其他本國機構的工作的協調，迎接即將進行的“新的東方之戰”。該協會主席費爾南都·克里斯托王教授說過這樣清楚明朗的話：

“淵源於對經商、傳播宗教和總體文化起着極其重要樞紐作用的葡萄牙與東方的歷史關係，產生出異常豐富的一份遺產。這份遺產從石頭建築到語言，宗教，風俗習慣，無所不包，如今已薄弱而分散。這一形勢，由於澳門要納入中國政權而受到進一步的威脅。因此，需要特別注意。因爲，如果說葡語在世界的某一個地區還得到敬重，那麼，這個地區主要在亞洲。”

克里斯托王教授最後認爲，需要增加講師室。這件事，透過與澳門政府的一個協議成爲現實，儘管實際中的某些協調問題，尚有待得到滿意的解決。

關於講師，也有幾句話要講。我們很難不贊同我們的大師，葡語文化中心的播種者奧古斯丁諾·達·席爾瓦教授（本人有幸在一九六三年認識他，並從此跟他保持長期的通信，從而受益不淺）在最近一次受訪時所說的：講師不應按候選人的興趣“這兒釣一個，那兒釣一個，應該是募徵而來的人，就似爲海軍學校或陸軍學校募徵學員一樣。他們應徵是爲葡萄牙文化在世界傳播聲譽”。

這種思想意味著需要一種新的使命感，需要把這一使命感再次輸入到我們的前線機構中，使得幾個年代之後的明天，我們在澳門和東方留下的記憶不僅僅是東一塊西一塊的石頭和聖名之城的象征——大三巴牌坊，或僅僅留下賈梅士洞。被譽爲“石質道經”的大三巴教堂，是團結在同一宗教理想的各式各樣的人們的愛情，信仰和犧牲的結晶，並且經受住時間的考驗。而從這個卡米羅·皮薩那稱

為“泛葡聖殿”的賈梅士洞，經過了好幾代中葡後裔的澳門人。不為政權，政府以及路過的人們的意願所制約，每年在葡國日都舉行一次儀式，緬懷詩人和祖國。

當然，除開上述，應同樣並根本地加強我們的經濟和外交影響。這一影響尚且薄弱，但如果當政者頭腦清醒的話，完全可以得到更大的發展。然而，這些方面已超出本人發言的範圍和大會給我的時間。

結束前，我只想提醒大家，經濟和物質遺產之外，文化遺產是我們從前人手接收到的最大禮物，它是一個繼往開來的系列牢固的紐帶。

正是這種接收和傳播文化的可能使得社會成為“活生生的人”的社會，也就是說，可以進行巨大的變革和完成偉大的事業。

只有從文化交流及其理解和互相尊重中，賦於其價值和尊嚴，方可產生出和諧的夢想。多個世紀的交往，為我們奠定了共處的基礎。如果我們在社團內以及在社團之間意識到要腳踏實地，從現在做起，並努力尋求未來的道路，這一共處便能夠繼續下去。